

一 我是女人，我骄傲

“一塌糊涂”

听叔本华讲“骄傲”

母性的天职

女孩的羣性

女人的亢奋

第一次接触他

反抗与随缘

男孩子的“哥们儿”

我真是男孩的命吗？

一位男护士长

“一塌糊涂”

有位西方地理学家谈及北京的天气时说：“北京的天气，冬天异常寒冷，夏天湿热。”他指的是 20 世纪初的情景，时隔半个多世纪，北京的冬天已不是“异常寒冷”，夏天也不是“湿热”，而是燥热，干燥的风刺溜着皮肤才叫燥热。

就在这样一个燥热的夏夜，我四年来第一次把北大校园溜了个遍，最后来到未名湖畔。

未名湖是北大校园的象征，冬日的湖面是溜冰的游戏场；夏夜的湖畔神秘莫测，不知要隐藏多少学子的憧憬和情思。此时虽近午夜，三三两两从我身边走过的学子，使我感到一种特有的孤独。我不敢正视他们，害怕碰到熟人。

自四年前走进北大生物学系以来，学科成绩垒出了三级“优异”台阶，年龄 22 岁，共产党员。毕业前填写分配表，惟有性别栏的“女”字成了一家研究所人事处长拒绝接收的借口。

那个单位为国家级科研单位，天子脚下，无论将来搞专业，还是从政，都是近水楼台。人人向往的、但并非人人都能奢望。而我作为第一批优等生，特别推荐、同学都说这是意料。事有的同学要跑单位，甚至连家庭都全力以赴，有的父母开着车子提前跑了一年他们对我的幸运不能不羡慕和嫉妒，连我自己都要嫉妒自己了。

历数 16 年来的求学之路，16 年来一梦中，可谓亨通，可谓“利涉大川”了然而，“物不可以终通”。物极总有走

向反面的时候，通的反面就是塞，亨的反面就是阻，泰的反面就是否。

社会的交替，人生的得失，竟与生物细胞的分分合合如此相似。

下午，学生部找我谈话。带着憧憬和猜测走进那座红楼，却如一落千丈，如坠五里云中似的从红楼里走出来。学生部对我竟然是如此的陌生。在大学生包分配的年代里，学生部掌握着每个学子的前途和命运，但大多数同学对这红楼里的学生部却“无事难登三宝殿”。

我的分配表被那个单位退回来了，理由有二，一是女的，担不起重任，二是在校一直佼佼，参加工作容易骄傲。而此时，第一批理想的单位都已对号入座，尽管学生部答应为我重新考虑，但我明白，属于我的机会已经擦肩而过。我坐在那里咬了半天嘴唇，强忍住哽咽在喉的委屈和冲动，一个字也没吐出来，只是点点头，记不清当时是如何走出了这座第一次光顾的红楼。

此时，正是午夜时分，万籁俱寂，我却躲进这片寂静中，默默地发泄着一直哽咽在喉的眼泪，我真想放声痛哭一场，让眼泪流进未名湖，让湖水与我做证。四年来，湖水可是第一次看见我这般沮丧，这般无助，这般欲哭无声，借着湖光，泪眼望泪眼。

我不知道未名湖寿已几何，但我知道湖中的水，早在人类产生之前，生于太极的“气之初”、“形之始”、“质之成”。水自产生之日起，至今依然保持着她的清纯和亮丽，永远年轻。她是伟大女性的见证人，百万年来，不知是女人效法了水的“上善”，还是水模仿了女人的柔顺，女人的性格、身

腰，乃至容貌，最恰当的比拟，只能是水。

我撩起湖水擦洗去泪痕，让水的清凉舒展我心中的不平。

湖的东隅有塔，塔身映入湖水，虽夜色朦胧，但塔影仍清晰可见。由塔前辗转向南，是刚刚新建的亚洲第一大图书馆——北大图书馆。这一湖、一塔、一图，构成了北大校园特有的风景线。偏偏有人自嘲自贱，把它叫做“一塌糊涂”。

我面对夜色中的塔影自言自语地说：“不，谁说‘一塌糊涂’？这一不是一切，只是一个，仅此我一人而已。”不错，北大学子也有糊涂的时候，但这种糊涂是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持疑，是在个人事务处理上的心不在焉，是拳拳爱国而乾乾苦学的大智若愚。

听叔本华说“骄傲”

此时，我似乎清醒了许多，心也平静了许多。我朝向湖中的塔影点了点头，示意我该回宿舍休息了。

回到宿舍，同学们都睡熟了，我蹑手蹑脚上了床。可是，刚刚迷糊一下又醒了过来，仍然睡不着。那个单位人事处长的两条理由依然在脑子里过滤。

女人怎么了？女人的肩膀真那么嫩生吗？真担不起重任吗？解放四十年了，改革开放也十几年了，怎么还养出了这么一个不讲理的酒囊饭袋做领导，甚至做了这么重要的科研单位的人事处长？也许真是古人那句话吧：“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差别存在，就难免没有腐败存在，就难免没有这样的酒囊饭袋。

我不想跟这样的“处长”计较了，我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个别人的“近视”、“弱视”和“夜盲”，只能是充满阳光的世界中的一片阴影。此时，我越想越兴奋，仍是睡不着。我索性坐起来，躺在床上想默读点什么。这是我的习惯，躺着不能入睡，干脆靠着睡。为了控制胡思乱想，就默读一段诗词，一段古文，于是，渐渐地就能入睡了。此时，我竟然想起了叔本华的那篇散文《骄傲》，也许又是那位人事处长那句话刺激缘故吧。

叔本华是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唯意志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骄傲》一文中说：

“骄傲是一种内在的活动，是人对自我直接的体认。

“唯有对自己卓越的才能和独特的价值，有坚定、不可动摇之确信的人才能被称为‘骄傲’，……”

“通常，‘骄傲’总是受到指责；可是我想只有自己没有足以自傲之物的人才会贬损‘骄傲’这种美德。我们看世俗的卤莽与蛮横，任何具有优秀品格的人，如果不愿他的品德永久被忽略，就该好好正视自己的好品德；因为假如一个品德优良的人，好心地无视自己的优越性，依然与一般人混同一气，随波逐流，那么用不了多久，他们会坦白而肆无忌惮地把你看成他们的同类。

“当谦虚成为公认的好德性时，无疑地世上的庸人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每个人都应该谦虚地不表现自己，世人便都类似了。这真是平头的平等啊！它是一种压制的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世上就好像只有庸人了。”

读过叔本华的这番议论，谁都会由此引起些联想，原来那些害怕他人指责“骄傲”的怯懦心态，似乎麻木已久的皮肤突然感受到了温暖，受到过伤害的心也会得到慰藉。

我想，我应该为一个女人，为一个追求成功的女人，树立坚强的自信，培植骄傲的资本。须臾间，一种坚定的念头倏然产生了一一我要留校读研。从学士、硕士、博士——“黑”到底（因为学士帽、硕士帽和博士帽都是黑色的，所以学子们都幽默地以“黑”而自嘲）。

此后的四年，我一口气读完了细胞生物学及遗传学，环境生物学和生态学。最终戴上黑色的博士帽，从“一塔湖

图”中走向了社会，并如愿地走进了当年想进而未能进的科研院所，圆了四年前的梦。当时，我真想找到那位人事处长，告诉他：“我仍是一位女性，但我如今更有骄傲的资本。”

母性的天职

我怀孕了，而且到了预期产期。于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又现实的问题提上了日程：是自然分娩还是剖腹产？这个问题，我和我的同学、同事和朋友们早已争论过几百遍了，但我始终坚持自然分娩。我要体验一个做母亲的全过程，包括受精、怀孕、分娩、哺乳和母教，我认为，这些都是母性的天职。在与细胞和染色体频繁的接触中，我甚至意识到：如果让女人的母性蜕去，完全由科技替代，那么，人种的蜕化也将为期不远了。

现代人在破除了旧俗中的种种迷信后，又不知不觉地步入了另一迷信的误区——过分地迷信科技，而忘掉了自然界的本原和人的天性。特别是在人类繁殖、生育方面出现的种种新生代理品——如体外受精、试管婴儿、剖腹产、代乳品等等。我是一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我不会反对科学，也不可能不知天高地厚去抗争科学。但是，科学的伟大之处是准许怀疑的，正如释迦牟尼自信他的教理一样，允许弟子们怀疑，他说：“不疑不悟，小疑小悟，大疑大悟。”因为佛教是科学的，科学的东西都是经得起怀疑的。

因为怀疑而常常生起些奇思异想，我从接触细胞研究时起，就开始产生各种各样的奇思怪想。那些时候确定是一种着迷。回想当初那些日子里，天天呆在试验室里守着显微镜，观察各种动植物细胞的纵截面和横截面，细胞壁、细胞膜和细胞核，脑海里全成了细胞图像的世界，走到大街上，

行人都成了千奇百态细胞；吃饭时，饭粒也成了细胞；晚上抬头看天，满天繁星也成了细胞；连自己也被想象成了一个细胞体。结婚后，我就一直想象着，那一天的那一刻，会有一颗卵细胞接受精子的挑战，欣然受精，担负起发育胎儿的光荣任务。

这一天、这一刻终于盼到了，那晚刹那间奇特的快感使我终生不会忘记。也就是自那一刻起，一种母性的天职油然而生，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个做女人的滋味，一种奇妙的神圣使命感陪伴我度过了十个月。

如今，分娩的时日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难以想象的疼痛正在向我走近，我开始有些恐慌，毕竟是做女人的第一次，祸福未卜，喜忧未卜，一个新生命诞生的那一刻，一个母性履行自己神圣使命的那一刻，往往是在警钟的尖啸中光临的。那一刻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会发生什么事呢？

临近分娩的准备阶段，我反而镇定了许多。毕竟我是在现代化医疗条件的妇产科产床上躺着，静静地等待着那神圣的一刻。也就在这一刻，我双手轻轻抚摸着隆起的肚皮，眼望着天花板。我突然想起了恩格斯那句名言：“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我想，女人怀孕、分娩、哺乳不也是一种人类神圣的劳动吗？

我想象着：如果一个人的诞生离开了母体，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体外受精、试管孕育，甚至克隆，也许是为女人着想，能减少女人的十月怀胎和一朝分娩的痛苦，以及哺乳时期的艰辛……然而，这真是为女人好吗？那样做，减少的仅仅只有痛苦和艰辛吗？聪明透顶的科学家们往往让客观上的技术性占了上风，而主观上的人

情味退居于二线、三线。他们怎么也体会不到一个女人的真实感受。实际上，在减轻痛苦和艰辛的同时，连受精时瞬间灵动的快感、孕育期夜长梦多的牵肠挂肚，分娩时呻吟着的希望之想，孩子吮吸奶头时的舒适感等等都会远离女人而去。更让女人难以接受的是，一个女人的母性的天职被剥夺了，母性的慈爱莫名其妙地失去了交流的宽带。免去了女人这些生育过程中的系列劳动后，一个女人除了像男人一样拼命工作外，还有什么特征、优势和自信可言呢？

我再进一步想象，如果一个受精卵不能带着女性灵动时的瞬间信息，被动地去接受精子的挑战，而一个被动受精的卵子只能在一支离开母性信息场的试管中被动地发育着，那生出来的孩子还会与母亲心连心吗？母亲的爱、孩子的爱是两个概念化的装饰品，还是寄托于另一种外在信息场中的游离物呢？这种始终游离于母性信息场以外的人种，一代代传承下去，还能保留人类原来的种性吗？

我是做科研工作的，即使是分娩前的奇思怪想也离不开严谨的科学论证这一职业特性。近现代考古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根据大量的古猿遗骸化石的考证，发现古猿有好几个不同的种属，其中一些种属向前进化，发展为“完全形成的人”，即真正的人类；而另一些种属仍保留着古猿的特点，有的甚至在一百万年前就逐渐灭绝。这进化和退化的分界线就是劳动与不能劳动之间。根据现代信息工程理论分析，劳动能产生信息，劳动的环境就是一种信息场。长期置身于各种劳动的信息场中，人的全部机体，特别是双手、语言器官、脑髓和感觉器官等都会发生一系列重大的变化。

祖先是我们的镜子，也是未来的镜子。从这面镜子中，

我们不仅仅能看到一百多万年前古猿、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种种劳动场面，还能透视到劳动所产生的信息场，以及这种信息场对产生人类的积极作用。

试想：如果未来的人类，繁育的一切过程中免除了女人的劳动，都离开母性信息场，人类的种性会不蜕变吗？

这种奇思怪想一下子驱散了走进产房时所有的恐慌和忧虑，顿然觉得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快要当妈妈的女性的崇高和伟大。

女人，不是简单的生育工具；同时，也不能放弃一个伟大母性的天职！

女孩的性

我自童年时代起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我从来都不知道女人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方式生活。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就感到自己负有一种责任，一种好奇心中产生的责任。记得上小学一年级时，我接连几天追问老师：“老师，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为什么只挂毛主席像不挂共产党像呢？”老师怎么解释我都没闹明白，总是觉得应该让家里也挂上共产党的像。甚至上书店时问柜台里面的人：“有共产党的像吗？”我每次这样问，都有人笑我，我不懂得他们笑什么，有机会还是想问。我就是这样执著，这种执著一直伴随着我，给过我帮助，也给过我烦恼。

我小时，是一个嘴上话多，心里话也多的女孩；长大了，则是一个嘴上话少了，心里话却更多了的女人。不是不想多说，而是在反思儿时的许多话说得太离谱，太让自己失望。有些时候，别人笑话我、指责我说错了时，我总是很茫然地看着对方，甚至是瞪着一对傻乎乎的眼睛面对一群人。但我从来没有服气过，特别是对那些男孩子的嘲笑。我从来不怕男生嘲笑，反之，他们越嘲笑打俏我，我越能发奋，越能求上进，也越能与他们打成一片，他们最终只能接纳好，甚至佩服和崇拜我。现在想起来，还真得感谢当初那些与我过不去的男孩子，是他们把我推着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

女人的亢奋

每个人的生活都存在着节律性和周期性，而女人的周期性就显得格外突出。女人的情绪往往受这种节律的影响，是否是受了一种月汐潮起潮落的缘故？我也说不清。总之，女人自己也说不清。每次周期的交替也许与人不可能在完美中长驱直入，或不可能始终处于亢奋的状态而不得不控制节律。有些内在的联系。这种现象，如果撇开女人的生理特征可能更难以解释。我就有切身的体验，也许这是每个女人必然的体验。

我就存在着许多亢奋的周期，特别是遇到新课题的关键时刻，持续的时间会更长，甚至会将神经绷到迷狂的程度；时而又会陷入冷静的周期，情绪明显向下滑落，创造之火也渐趋黯淡。

每当亢奋时，我会问自己：这是一个女人所能承受得了的吗？女人是亢奋些好还是低潮些好？人的兴奋细胞数量有没有性别的差异，尽管不能得出严谨的科学结论，但个人的切身体验中，往往能排出前后对照系数表。我通过自身的比较，自我感觉：亢奋过后的低落会成为下一轮亢奋的预备期。没有积极意义上的亢奋，也就没有享受性的低落，可能会是一种痛苦的节律紊乱的低落。一个女人，如果生活在那种始终亢奋或始终低落的情绪，怕是精神出毛病了。

第一次接触他

第一个对我真动心思，也是让我第一次动心思的男子来得晚了点。他是我的一位同事，一个嗜烟如命的男子汉。

我对烟历来特别敏感，总感觉那些叼着香烟，或手指间夹着香烟，在公共场所吞云吐雾的男人最不讲公德了，多少老人、妇女、小孩在无辜地吞吸他们的“尼古丁”，忍受那种污浊的空气。

可想而知，我开始对他——这位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的男同事是多么的反感和厌恶。有次单位开会，他竟然坐在了我旁边，尽管他没抽烟（单位开会不准抽烟），但我仍是忍受不了他身上那股烟味。我开始是装着没事似的捂捂鼻子，后来干脆用手扇着鼻前的空气，一副极厌烦和难受的样子。这种难堪大概只维持了几分钟，他不声不响起身换了个位置。

会散后，他追上我，试探地说：“我身上烟味那么重吗？不好意思。”

“也没什么。”我笑了笑，头也没回。

“我早想戒了它，不知戒了多少次，结果越戒瘾越大。”他以近乎歉意的语气作着解释。

我微笑着朝他白了一眼，说：“你们不是说‘不抽烟的男人不是丈夫’吗？既然是大丈夫，怎么连戒烟的勇气也拿不出来？”

他怔怔地望着我，口里喃喃无语。

我不依不饶的脾气又上来了，继续数落他说：“既然是

丈夫，为什么要用这支烟以壮一个堂堂男子汉的威严呢？难道离开了它 就不足一丈了吗？”

他仍然是怔怔的，惊异地看着我。

“依我之见，你们吸烟的男人哪，并非戒不了一支烟，而是控制不了自己。试想，一个没有自制的的男人，与一个没有自理能力的弱智有什么区别？请问这丈夫——”我以目光示意高大，又以手指夹烟的动作演示说“与这寸烟之间又何论短长？”

我原以为他会为之与我争辩一番，甚至会生气的。谁知他眼睛一亮，仿佛突然振作起来似的表现出一种绅士风度，十分感激又不卑不亢地伸出右手：“谢谢！希望我能成为您心目中的‘丈夫’。”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言 想把手缩回去。就在这一刹那间，我感觉到了他的真诚，立即大度地伸出手去，与他匆匆握了一下。

事后，我也像过去一样没往心里去，不知道他有没有留下阿 Q 手上的那种滑腻感，并为此而失眠过，兴奋过，惊慌过。我没有去想他，更不可能去问他。我历来是大事小事过去了就过去了，不往心里去。作为女人，心里事装多了，总会平白无辜地勾起无名的烦恼，何必呢？这不是自己折磨自己吗？古代多少才女不就是精明得过度，事事都往心里去，事事都去计较，自个儿折磨死的吗？教科书上抨击封建社会已有不少年头了，如果实话实说，女人自身也该负些责任。我觉得女人的最大弊端就是爱自己折磨自己，自身没事便想着法去找事，结果事越来越复杂，又舍不得舍弃，全装在心里，还时不时地去提及它。这种心事重重沉不沉？这种活法累不累？

反抗与随缘

我是一名女性的反抗者。每当我最大限度地去努力做出顺从和谦虚的选择时，我仍是一名斗牛般的反抗者。并不是由于某个阶段中的生活变化或环境差异而成为反抗者的，而是一种女性中特有的“犟性”，也许有些人收敛了这种“犟性”。

我的这种天性使我强烈地钟情于那些历史上所有的伟大抗争，如：路德的抗争，反对权威理性启蒙的抗争，卢梭的“自然”抗争，法国大革命的抗争，唯心主义反对客体统治的抗争，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的抗争，尼采反对理性和道德的抗争，易卜生反对社会的抗争；以及中国古代屈原斗胆“问天”的抗争，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抗争，李清照“寻寻觅觅”的抗争，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抗争……

我是一个女性抗争者，但只是一种精神思维方式上的抗争，而生活中却处处表现着一种随缘与和顺。如果有人提出要与我交换办公桌，亦或一条项链，我决不会在得失上有半点犹豫。有一次，我托一位同事为我带买一台电扇，她问要台式，还是落地的。我说“随便”。她问要多少价格的？我说“随便。”她又问要什么品牌的，我还是说“随便。”我在生活和人际交往中的“随便”，有时真叫人受不了。在我们的婚礼上，主持人要我们俩各说一句话，我脱口而出：“跟着缘份走。”当即引起一片认同的掌声。事后，我给大家解

释说，不能跟着感觉走，感觉有误区，人只能跟着缘份走。
缘是各方面的条件，缘是大自然变化的规律，缘是人际交往
的游戏规则。